

中国文化源远流长,中华文明博大精深。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,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,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——习近平



(扫码观看视频)



(扫码观看图文)

寻禹·探源报道顾问团成员 (排名不分先后)

- 刘俊杰 具茨山上古文明发现者 禹州市著名文化学者 浙江省绍兴市文史馆副馆长 蚌埠禹会村遗址工作队原队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员、瓦店和王城岗工作队原队长
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瓦店工作队队长
赵海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员、瓦店工作队队长
赵春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员、瓦店工作队队长
刘海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瓦店工作队队长

王城岗遗址篇

阳城：寻找夏禹所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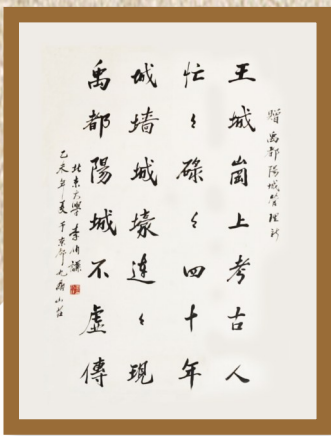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邓雷 刘俊民 杨红卫 文 吕超峰 图

如果把对夏史的追寻比作一场惊奇不断的探险之旅,那么,最激动人心的旅程,莫过于寻找夏代第一王——夏禹的居所阳城。

在历史文献中,阳城是雄踞于夏史起点的圣都,散发着迷人的光辉,吸引着考古人全力追寻,世代相继。

有时,他似乎已袒露了容颜;转眼,却又模糊了踪影。这正是考古的迷人之处。

位于嵩山脚下的登封市告成镇阳城遗址,在众多“阳城”竞争对手中遥遥领先。



李伯谦题字



阳城牌匾

测影：从陶寺到阳城

告成镇的元代观星台遗址,作为登封“天地之中”历史建筑群的一部分,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周公立杆测影,也在这里。

鲜为人知的是,观星台遗址旁,竟然别有洞天。一墙之隔,就是阳城考古队的驻地。那里陈列的阳城遗址考古成果展,把观星台的历史,延伸到了更为古老的夏代之初。

7月28日,站在周公测影台前,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告诉记者:“观星台的历史,也是阳城久远历史的一个佐证。”

据介绍,“日影千里差一寸”的观念,在中国天文学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。有学者认为,这一观念的产生,与嵩山的这个观星台有直接关系。从这里向北约1000里,正是传说中的尧都——山西陶寺遗址,那里发现了史前的观象台。在这两个地点观测夏至日影,分别为1.6尺和1.5尺。

尧舜禹时期,正是中国文明史上日影测量和大范围地理测量的肇始期,由此产生了“日影千里差一寸”的理论观念。

发现：备受争议的小城

王城岗遗址在登封市告成镇西,是一处颍水与五渡水交汇地带的台地,紧邻八方村,故一度称为“八方遗址”。身临其境,可以南瞻箕山,西望嵩山少室,北面隔王岭尖,即嵩山太室山。

北朝时期,郦道元写作《水经注》时,早已明示这里是“颍阳故城”：“(五渡水)东南流入颍水。颍水迤其县故城南。昔舜禅禹,禹继商均,伯益避启,并于此也。”

阳城由来已久,秦代设阳城县,唐万岁登封元年(696年),武则天改阳城县为告成县。后,告成县废,并入登封。

1951年,为配合治淮工程,文物部门在颍河上游进行文物调查,发现了八方遗址。

1959年4月,徐旭生先生在著名的“夏墟”探索之旅中,对八方遗址进行了重点考察:“遗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,小部分在南面。根据地面调查及钻探的材

料,我们初步认为东部似以龙山为主,兼有早殷遗物,西部似以仰韶为主,但东西均兼有仰韶、龙山的陶片。”他探讨了阳城的地望与夏禹的关系,指出舜当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脚下,禹继承家业,在嵩山之阳筑城居住再合适不过。

为了探索夏代文化遗存,从1975年起,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安金槐的带领下,以告成镇为中心,展开了大面积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。1977年,他们发现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,并在王城岗发掘出两座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垣遗址,发现埋有人骨的奠基坑,也发现了青铜器残片。

此处城垣的夯筑方法很原始,正符合中国古代城垣建筑由小到大、从原始趋向成熟的发展规律。

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发现龙山文化晚期城址,对探索夏文化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。

接力：华夏实证有大城

一石击出千重浪,王城岗遗址的发现,引起了持久的回响。围绕这里是否夏禹所居的阳城,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。

从1977年王城岗龙山城发掘,到1983年简报发表,再到1992年考古报告出版,王城岗龙山城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。作为遗址发掘者和报告编写者之一,方燕明也一直在思索这样几个问题:

王城岗除了小城,还有大城吗?

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,小城废弃后,三、四期依然昌盛,它为何而兴?

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面积究竟有多大?

龙山时期的颍河上游,王城岗遗址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?

新的契机悄然到来。1996年,为了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——

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的需要,方燕明重回王城岗遗址,开展含碳样品的采集和收集工作。他测出的10多个碳十四数据和研究成果已被收录到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~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(简本)》中,其学术价值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。

2002年至2005年,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,方燕明等人对王城岗遗址的年代、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进行了专题研究,取得重大突破。在登封王城岗遗址,发现了一座面积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城址。经多次调查确认,大城面积为34.8万平方米。

方燕明说:“发现的大城城壕打破了西小城城墙的地层关系,证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时,小城建成稍早,后来被废弃并修建大城。据测定,王城岗龙山文化小城的年代在

探索：多学科力量的汇集

王城岗大城发现后,不同学科的专家针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,在王城岗遗址开展了植物考古、动物考古、体质人类学研究、石器和陶器的工艺技术分析、实验考古、系列样品测年等多学科研究,取得了丰硕成果,为讨论王城岗遗址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社会复杂化及人口、资源、环境间的密切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坚实的资料。

经科学测年,王城岗大城存在的时间,在公元前2070年以内,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,也是文献中记载“大禹治水”的年代。

据实测,大城北城壕西部所开一探方,距偏东部所开某探方190米,二者高差4.346米,而城壕底部高差不足0.4米,证明当时城墙和城壕的建造,经过了事先设计和测量计算。这增加了中国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——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以疏导为主,必须具备相应的测量和挖掘技术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在龙山时代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工程,究竟需要集中多少劳力,花费多长时间?而这些劳力的支出是否能由王城岗一个聚落所承担,还是需要征集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?另一方面,对劳动力的组织、控制与管理的程度又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的重要标志。那么,能够修建这样规模城址的社会内部的复杂化程度又是如何?

为了解答这些问题,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模拟试验,建造大城城墙和城壕,从挖沟到堆土施夯,假定每天出动1000名青壮年劳力,约需要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;根据现代农村经验,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~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,要一年内完成这个工程,需要动员10~20个村落的劳力。

也就是说,王城岗大城的兴建,可能是动员了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。作为颍河上游周围数十千米范围内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,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可以看作是雏形国家政治实体的中心所在,即最早的夏都。


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墩

神秘的祭祀

赵春青

《左传·成公·成公十三年》云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可见祭祀与军事构成国家两项最重大的内容。目前,考古发现已表明,在夏代都城级别的遗址上都发现了大型的祭祀遗存——“坛”和“埤”。坛和埤是我国古代都邑中常见的祭祀场所。《礼记·祭法》云:“天下有王,分地建国,置都立邑,设庙、桃、坛、埤而祭之。”郑玄注:“封土曰坛,除地曰埤。”可见,人工建造的高出地面的圆形土台叫坛,低于地表的长方形浅穴式建筑叫埤。坛和埤,在禹州瓦店、新密新密遗址都有发现。

在禹州瓦店遗址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WD2F1,位于瓦店遗址西北台地上,南北长约31米,东西宽约26米,平面呈回字形。在该建筑的四周,发现与燎祭有关的红烧土面、红烧土坑,与埋葬有关的五谷坑、重要遗物坑,与祭祀活动相关的人牲(人骨坑)、牺牲(动物坑),与摆放祭品有关的黄土墩,与祭亭类设施有关的柱洞等。发掘者认为,这些大型建筑,是祭祀建筑中平整地表面后形成的“除地曰埤”之埤,祭祀对象可能是地祇、百物神或祖先神等。

2002~2005年,在新密新密遗址内城偏北处,也发现一座浅穴式大型建筑。这一浅穴式大型建筑的平面呈刀形,其中西壁已遭破坏,其余的北、东、南三面均有迹可寻。此外,该建筑内部也未发现隔墙之类的遗迹。可见,这是一座不分间的通体式建筑。

新密期晚段的多次使用的大型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,位于整个遗址的最高处,其浅穴式的特点,正符合“高而入于下”的特征,在其附近发现有同时期的整猪和盛放较多兽骨的小灰坑,说明这一浅穴式建筑遗迹的可能就是“坎”“埤”之类的祭祀遗迹。

其实,在二里头遗址早已发掘出此类祭祀遗迹,有“坛”和“埤”两类。所谓“坛”,主要是平面大致呈圆形、凸出于地面上的土坛,坛径一般在5米以下。坛上分布着一圈或二圈圆形“土墩”,坛的周围是干净的场地。所谓“埤”,是一种平面呈长方形的,里面铺有净土的半地穴式建筑遗迹,往往里面还有成片的烧土面。

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,有可能与五子之歌有关。在该遗址发掘出东、西两个相邻的灰坑,其中西面的是长方形,东面的是近正方形,并有火烧的迹象,出土有鬲、三足盘、甑、蛋壳彩陶等。同一件器物,却被发现于两个灰坑之中,这两个灰坑显然,也非常罕见之灰坑,应是祭祀坑。

大禹像



登封观星台

王城岗遗址发掘现场

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陶罐